

· 读史札记 ·

郑观应并未出卖梁启超

周 辉 湘

郑观应在戊戌政变后对待梁启超的态度,多为史家齿冷,或谓绝情断义、落井下石。但仔细考察,存疑甚多,不可不辨。

关于郑观应密告梁启超行踪,欲置之于死地、或客观上会置之于死地说纯属误解。此说源于郑观应1898年9月22日致盛宣怀密函:“敬密肃者,顷闻梁卓如扮日装到沪,想小田切总领事必知确否,今相见可询之。不可谈闻于何人。至祷。……阅后付丙。”^①有人据此推断盛宣怀曾向消息灵通的郑观应探询过康有为、梁启超所在,而郑观应知道盛宣怀负有逮捕康有为、梁启超的使命,写了这封密告信。写信日期紧接在政变之后,收信人盛宣怀反对维新变法,政变后又负有清廷使命。表面看来,郑观应扮演了告密者的角色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

首先是时间不符。9月19日,“上诣瀛秀门”,迎西太后还宫^②21日,上谕“康有为结党营私,莠言乱政”,革职并与其弟康广仁交刑部按律治罪^③恭请西太后“训政”。23日下令逮捕张荫桓、徐致靖、杨深秀、杨锐、林旭、谭嗣同、刘光第。28日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。29日上谕:“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,所著文字语多狂谬。著一并严拿惩办。”^④可见清廷下令缉拿梁启超,是在郑观应密函发出七天之后,在一个星期前,郑观应怎能预知清廷要下令逮捕梁启超,并告密抢功呢?

再看盛宣怀负命协助缉拿康有为时间。9月22日,清廷电寄荣禄等于天津、上海等地严密查拿康有为。康有为于19日离京赴天津,21日转往上海,他离京是奉上谕往上海督办官报。因之,政变事发,清廷立即根据其行踪,密令天津、上海两处缉拿。也在22日,上海道蔡钧接到刘坤一密电,“密速觅线派人会知英领事逐船搜捕”,“密商盛京卿严飭三公司,于今晚明晨由天津来沪轮船下定江中,听候查拿奉旨要犯。”^⑤这道密电布置对由津来沪中外轮船一体搜查,以确保逮捕康有为归案。9月23日,蔡钧密函盛宣怀,转抄刘坤一密电原文,并附言:“苕筹饬遵,无论北来何船,如遇县委差捕上船查拿,勿任稍有阻格。”^⑥戊戌政变祸起萧墙,事属绝密,外间虽有传闻而不得确知。蔡钧收到密电是在22日午夜,郑观应密函是在当日午时,盛宣怀却是次日得知密令。可见郑观应密函在前,蔡钧奉命在后,盛宣怀奉命更在后,这时还谈不上郑观应知道盛宣怀负有使命。连湖南巡抚陈宝箴还在22日函电总理衙门,请召张之洞入都赞助新政,郑观应就更不可能知道清廷政变内情了。

其次,蔡钧奉命缉拿对象是康有为,不涉及梁启超。刘坤一给蔡钧密电中明白无误告诉他逮捕“奉旨要犯”康有为。何况缉拿张荫桓等人的上谕又说了对其他人不予追究,其时梁启超尚未被列入缉拿名单,即便是在上海,未奉清廷和刘坤一谕令,也无必要逮捕他。

再其次,盛宣怀在这次行动中的角色是协助,他的任务是命令招商局轮船到沪后,不得

靠岸，停泊江中待查，在搜查中不得稍有阻格，如此而已。盛宣怀对维新变法持反对态度，但对梁启超却颇为看重。姑且不论他对康梁看法如何，未负有逮捕使命是事实。认为他可能向郑观应打听，郑又向他泄密，只是一种推想，并无史实根据。

郑观应把消息限于他们俩人之间，要求“阅后付丙”，目的只是通过盛宣怀向日本领事打听确切。联系戊戌政变前后郑观应对维新派的态度，我认为关注、担忧梁启超安全更符合实情。他对变法运动的一贯态度是同情、支持，又不敢过多涉入。维新派很多主张都来自《盛世危言》，康梁要实行的，郑观应早就提出过，他们的交往有一定的思想基础。从他们的相互联系看，也并非郑观应事后所辩白的“交谊泛泛”。1895年11月，康有为来上海办强学会，郑观应列名会董，同意资助；他赠《危言》予康梁，梁启超又把书辑入《自强丛书》和《西学书目》；康广仁办《自强报》，郑观应又列名其中；戊戌年，郑观应也主张“亟宜开国，立宪法，团结民心，同御外侮。”^⑦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前，康曾问计于郑政治能即变否，郑答曰“事速则不达。恐于大局有损无益。譬如大指与尾指交，二、三、四指不扶助能举重否。”^⑧可见他对形势的分析是准确、中肯的。经元善参加维新办女子学堂，函商于郑，他完全赞同，并在他家开过筹备会议，筹措经费办法也是他提出的。从上述事例看出，变法运动期间，郑观应的思想倾向和行为都与维新派相通。是否在戊戌政变关键时刻他卖身投靠呢？情况也并非如此。政变后不几天，郑观应致书迎接康有为父亲到澳门避难的何穗田，寄100元请转交康父，说“虽与康南海时尚无交情，惟念其救国之心，罹此重祸，甚可扼腕。”^⑨赞誉之情，溢于言表，并且“其旅沪之门弟子，弟已劝其离沪。”^⑩他赞扬六君子之一康广仁在狱中表现“临大节能从容如此者，盖由学有根柢也。”^⑪可见郑观应“幸康南海与梁君卓如闻风先出”的态度是真诚的。正因为如此，才使他在风云突变，康梁前途未卜之际，为友人担忧，传闻梁启超抵达上海，即探询确否。他与小田切的关系也非同一般，二人曾在该年五月组织“亚细亚协会”，分任正副会长。如果出于告密动机，他可以直接密告蔡钧，无须在密友中传递信息。

郑观应与变法运动又保持着一定距离，他并不积极参加变法活动。这当中有受盛宣怀影响，历经挫折后东山再起怕失去前途等，更主要的是他预感维新运动前景艰难。所以他对变法运动瞻前顾后，若即若离。政变后，郑观应几遭连累，有舆论说他与维新派关系密切。对此，郑观应匆忙向盛宣怀写信为自己洗刷，称“官应早一年已与督办言及，康梁办事毫无条理，不知度德量力，将来必有风波，岂得谓之同党乎？”^⑫这是他出于保全自己免被追究，是叶公好龙的一种表现，与绝情断义、落井下石风马牛不相及。

注释

① 盛宣怀未刊资料《郑观应致盛宣怀密函》光绪二十四八月初七日

②③④ 《光绪朝东华录》页4198，页4200，页4205

⑤ 《刘坤一致蔡钧电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七日已刻

⑥ 《蔡钧致盛宣怀函》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八日

⑦⑧⑨⑩⑪ 《郑观应集》下册页290，页1165，页1166，页1167，页1165

⑫ 《郑观应致盛宣怀函》光绪二十四九月十五日